

2011 年第 3 期
(总第 60 期)

海外华文教育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No. 3 2011
General Serial No. 60

十九世纪汉语的传播与流变： 《汉语手册》绪论(1863)

詹姆斯·萨默斯 著 亢永兴 方环海 译

(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 英国 伦敦 WC2R 2LS)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中国 厦门 361005)

编者按:英国汉学家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ummers)教授于1863年出版了《汉语手册》从学术史来看,该书能够站在普通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相对全面地考察了汉语的语言现象,许多观点非常精到,得出的一些关于汉语的研究结论,都已达到当时语言学界的前沿水平,值得重视。本刊2011年第1期曾刊发该书的《前言》部分译文,为了进一步引起对外汉语学界对詹姆斯·萨默斯这部重要著作的关注,本刊特地约请翻译并刊发该书的《绪论》部分,标题系本刊编辑部所加。

中图分类号: H1-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221-9056(2011) 03-0089-06

正如梵语在印度日耳曼语系或阿拉伯语在其所属的语系中所处的位置一样,汉语在东亚语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说,汉语甚至可以被称为包括日语、韩语、脚趾支那语(今越南)、安南语(今越南)以及中国境内各方言在内的诸多语言的鼻祖。广大的东亚地区,包括满洲、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本土,加之一些周边国家,在这片总面积与欧洲大陆基本相当的土地上,汉语一直是作为通行的交际语言而存在着的。历史上虽然也有个别地区曾对汉语的传播加以限制,并且将其仅仅作为官方的外事语言来使用,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汉语毕竟有着三亿的使用者,而正是靠着这一庞大群体的支撑,汉语最终自然演变成为东亚地区的交际通用语言。

在日本、安南,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地区,当地的学者曾经对汉字与汉语音节的原有形态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以致于汉语母语者都已经难以辨认。^[1]比如,日语中汉字“天”(tian)的发音被改造为“てん”;再如,汉语音节中“liang”中的鼻音“ng”则被省略掉,变成“liau”或“lau”的形式。对汉语而言,汉字的一个音节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表意的,但在日语中词汇的表意可以经常需要两到三个音节,比如“加”这个汉字在日语中演变为“か”(ka),并且失去了其汉语原有的“添加”、“增加”的词义,而仅作为一个音节存在;但另一方面,日语中也有一些词保留了汉语的本义,比如“長”虽然其发音变成了“naga”,但汉语的本义未变。而在安南语中,为了与本族语相融合,对汉字进行了更大的改造,诸多汉字只是单纯地作为音节而存在。

收稿日期: 2011-04-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资助。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南方基地专项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 詹姆斯·萨默斯(1828-1891),英国肯特郡人,教育家、学者,1848年任教于香港圣保罗学院,1852年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汉语教授。

译者简介: 亢永兴,男,陕西韩城人,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方环海,男,江苏沐阳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可以说,汉语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变化,甚至发生了汉语的“国别化”与“本地化”现象,但即便如此,正如之前曾经统治欧洲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汉语的地位牢不可破,仍是本地区内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在日本,中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诗人的作品被奉为经典,经由当地学者的注解,影响更大。日本所有名门望族的子女自入学伊始便开始学习汉语,对他们来说,汉语的学习与日语基本是同步的。孔子和孟子的作品对东方这些国家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孔子的成就能够更进一步的话,在历史上他必将成为东方的亚里士多德,但我们不能将这种历史高度上的落差归咎于孔子本人,这是东方各国独特的文化土壤所造成的。假如将历史上的二人进行时空互换,那么孔子扮演的也一定是与亚里士多德一样的角色,反之亦然。当古希腊的社会文明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时,以持久和牢固为特点的中国政治文化和智慧结晶却仍然能够屹立在东方,这无疑体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可延续性。

语言和文字的古老赋予了汉语独特的魅力,我们可以从中触碰到中国人世代因袭的政治和人文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孕育了他们比西方早两千年的文明。我们应该注意到,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在历史上并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异。随着时代的变迁,由于汉字缺少类似西方的表音字母系统,虽然有些汉字的读音发生了变化,但汉字形体却在几千年的演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中国文明觉醒于遥远的上古时代,并在一片蛮荒之中开始创造了古老的文字符号,而随着民智的发展和政治生活日臻成熟,更多能够表达权威和诠释社会生活的文字符号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用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并且用于日常生活的交流。^[2]

这些符号是象形和表意的集合体(形合和意合),即具体物象和精神意象的集合体。汉语中有约四万个汉字是以象形的方式构成的,用以记录那些具体的物象,之后,随着文化生活的深入,更多能够表达抽象意念的词汇也随之产生。凭借着四五百个基本的构字形式,汉字的表意深度是其他文字所无法比拟的,这种看似简单却又富含逻辑的构字方式使得汉字无论是在思想的表达还是语言的交流方面,其效果都远远胜过欧洲的文字。

与其他语言相比,汉语具有双重优势。首先,汉字的形体建立在具体物象和精神意象上,具有直观性;其次,由于自身特有的话语结构,汉语读起来朗朗上口,且在表达上既重点突出,又富含逻辑,可谓言简意赅。因为书面语和口语的表达方式并不相同,所以有的语言适合于书面写作,而有的语言则在口语表达上更占优势。在书面语中,几个简单的单音节汉字的组合便足以表达意味深长的语义,而在口语中要达到同样的语义表达效果则需要借助更多的语词。当然,就目的而言,书面语和口语不谋而合,即都在简明基础上追求逻辑性。

曾有著名的逻辑学家指出“表达缺陷是有效推理的最大障碍”^[3],但我们可以说在汉语中几乎不存在这种表达缺陷。只要人们认识到积极的系统思维的重要性,就能在诸多方面建立起完整的表达体系。相对而言,虽然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屈折变化,但是汉语有着非常丰富的词汇,而且在语义的表达上兼具准确性和深刻性,再加之句法与语用的复杂性,所有这些足以能够弥补其缺乏屈折变化的问题。实际上,汉语在理论上是有可能衍生出屈折变化的,比如借助具有指代作用的代词或介词的黏着,通过人为方式刻意为之,抑或通过非人为的方式,如口误的积累。但为什么汉语最终并未衍生出屈折变化呢?首先,用来表达具体事物或事物之间关联的词汇本身意思非常确定而且相互可以明显区别;其次,汉字在形态结构及表达方式上与其他语言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二者之间很难达成统一,这也同时能够解释为什么汉语中的代词以及介词难以发生黏着变化。虽然汉语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屈折变化,但却被中国人赋予了特别精致的句法结构,以此表达各种各样的语义。同时,汉字的形体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由大量复杂的语言符号任意构成的,正相反,汉字的构字成分极其简单,并且在相互派生的过程中仍保留其原有的形态和意义,这些构字成分的功能类似拼音文字中的字母,但它们记录的不是读音,而是意象。由构字成分构成最基础的一

些偏旁部首,以此为基础再衍生出千千万万的复合字形。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说,即使认识的汉字没有超过四五千个,也完全能够借助词源学的知识对那些复合汉字所表达的意义进行揣摩与推测。如此一来,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可能会认为,既然这四五千个基础汉字都是由214个偏旁部首构成的,那只要掌握了这些汉字其他的一切岂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汉字的派生和复合并非一成不变,有时看起来甚至可能无章可循,但这种现象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汉语也好,我们自己的母语也罢,在这一点上大同小异。

马礼逊博士(Dr.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译者注)关于建立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的汉语词源学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4],以下他的论述“古人见物造字,而后为了表达抽象的概念,汉字逐渐衍生比喻义或被当作口语中的助词使用。随着此类字的数量逐渐增加,有必要在字形上对其加以区分。例如,如助词‘之’(chī)源自‘芝草’(chī-t'saù, meaning the chi grass),语气助词‘乎’源自‘吁氣’(hū-kí, meaning the breath issuing forth in exclamation),表强调或疑问的助词‘焉’源自‘鳶’(yuén, meaning kite or fish-hawk)。探究象形文字的词源及其语义历时变化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事实上对于词义明确的汉字用法而言,目前的研究已经足够。”

“抛却上文中提到的词源研究的趣味性不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许多汉字在经历改造之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对它们原有形态的探究看似毫无希望可言。”这一评论道出了中国人在语言方面的独创性,对马礼逊这样权威专家的追随者来说,虽然对汉字词义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难度极大,但他们却对此充满信心。

学界对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乏溢美之词,其中阿伯-雷慕沙(Abel-Rémusat, 1788-1832, 十九世纪著名法国汉学家。——译者注)的描述最为贴切,我们在此不惧繁琐附上原文的译文“当听到别人谈论中国的几何学、天文学,或者博物学时,几乎所有欧洲人都饶有兴致。在过去两百年间,虽然我们在科学上取得巨大进展,我们也早已不必像以前那样时时向那些古老的国度去寻求知识,但难道我们就该因此而忽视它们如今和过去的一切吗?尤其在那些国度中,还有一个国家一直担当着智慧启蒙者的角色。中国在公元前2200年就发现了直角三角形的比例关系;为了治理肆虐的洪水,大禹在超过十万平方里格(1里格≈4.8公里)的土地上疏导了一百条河流,其总流量相当于美国境内大河的总和,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即便古中国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他们对于日食月食、掩星法、彗星,以及陨石的记录却成就斐然;即便人们坚持古中国在计算上的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善于观察。

除此之外,中国自然经济被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学者们完全能够证实这一点。之前欧洲人并不能自由进出中国,所以,在对当地自然状况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以严谨自居同时对其他民族贸然蔑视。透过一些摘自中国植物学和动物学著作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的成就并未达到如卡尔·林尼厄斯(Carl Linnaeus, 1707-1778, 瑞典博物学家,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译者注)、朱西厄(Antoine Laurent de Jussieu, 1748-1836, 法国植物学家。——译者注),或戴斯·丰泰内斯(René Louiche Des Fontaines, 1750-1833, 法国生物学家。——译者注)的高度,但却远高于拉美或中世纪时期的博物学家,而要是提到文学、哲学与历史,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要高于我们。

这是一座具有四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学宝库,看看那些隐喻与寓言,汉语以它独特的美感让中国文学显得更富诗意。想象,就像多种美丽的颜色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多姿多彩的画面。另一方面,一本本手抄书籍也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关于古老中国甚至关于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鞑靼部落,西藏,以及南亚半岛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包括孔孟经典、道家方术,以及佛教教义。面对如此一座宝库,即便身在欧洲的学子们也恨不能够在这片浩瀚书海中感受一下那些来自这一遥远国度的智

慧。在皇家图书馆不惜代价耗巨资收集到的五千卷书籍中,艾蒂安·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法国人文学者、汉学家,曾与黄嘉略合作编纂《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译者注)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也没有几本,另外,除了法国著名汉学家大德金(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和勒胡戴奥特赖(Des Hauterayes)翻阅过为数不多的书目外,余下的绝大多数仍等待着未来读者和翻译家们的垂青。^[5]

在欧洲有这样一位东方学家,他的学说在欧洲有着崇高的地位,这里的汉语学习者也对他充满敬意,他就是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雷慕沙本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很深入,取得的成绩更值得我们学习。虽然当时学界存在着诸多针对中国或汉语的诋毁之辞,但雷慕沙的视角却与众不同,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被中国历史上的个别昏庸君王或暴民运动所蒙蔽,而是透过先贤们的著述来了解中国。即便是那些本应对此有一定程度认识的人,我们也常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针对中国的偏见,虽然有些偏见也并非毫无道理,却终究缺乏详实的根据。例如,“汉语在口语表达上处于弱势”,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偏见毫无道理可言,汉语让说话人能够不受语法框架及其它条条框框的束缚,通过暗指或其它修辞手段让话语富于美感,并通过多样化的遣词造句方式影响听话人——或使用村野习语、或不怀好意的微笑,或嘲弄对方的吹毛求疵。

我们虽然不能据此便认为中国的政府官员们肯定在口语表达上更强势,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具备了同样的雄辩天赋,即使在特别有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仍然难以像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 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和雄辩家,希腊联军统帅。——译者注)那样强势地表达自己。实际上,这与民族性格有关,而非语言本身的问题。当受到情绪激发的时候,汉语的表达不单能够适应即时的表达需求,同时也能够让工作开展得如鱼得水。

在此,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汉语的各支方言。虽然汉字是通用的,但作为母语的汉语在各省际间的发音也多有不同,有时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相邻省份的人之间很难听懂对方所说的话。如果一个广东人遇到一个上海人,为了让对方听懂自己的话,他们必须将自己方言中对方听不懂的部分过滤掉,或者使用在学校里学到的书面语进行交流。虽然有着共同的话语基础,但广东话和上海话在发音上区别巨大,尤其在双元音上,当然,这种发音上的变化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这在其他语言中也是如此。至于方言中的俚语,这无疑更成了不同方言间交流的障碍。如此所论,似乎显得抽象了些,也许只有制作一个方言对比分析表才能够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汉语母语者来说,方言间的这些差异还没有达到让人望而生畏的程度。国内的商人一般都能够粗略通晓四五种方言,因为各支方言的书面语系统是相同的,所以一旦掌握了汉字或汉语官话,汉语母语者便能通过比较分析进而通过几个月的练习初步掌握方言的用法,但对外国人来说这一过程则需要更加系统深入地学习。在使用罗马字母体系注释发音方面,外国人比汉语母语者更具优势,除非后者也曾学习过欧洲拼字法。对欧洲人来说,借助罗马字母体系,他们能在头脑中很快反映出各支中国方言的发音差异,这无疑对语言学习有巨大的帮助。比如,他们能够认识到,汉语中最主要的几个元音 a, i, u (ah, ee, oo) 在各省的方言中也多有体现,因此 pa 在上海话或广东话中的发音仍然是 pa; 南京话中的 ki 在北京话中的发音仍是 ki, 只不过后者送气更强烈; 宁波话中的 ku 在其他方言中也都发成 ku。至于差异的方面,比如官话中的 kai 在广东话中发成 koi, 在上海话中则发成 ke; 官话中的 yau 在广东话中发成 yiu, 上海话中发成 yo (yaw)。通过此类观察,他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方言的发音差异主要体现在双元音上(包含两个元音)。其实在英语中,这种情况也多有体现,比如含有双元音 au 的单词,例如 clause 和 pause, 随着时间的推移 au 的发音已经变成了如单词 order 中的次元音 o。这些富有规则的变化说明汉语引进罗马字母注音系统的重要性,这必将为方言的学习带来极大的便利。设想一下,倘若法语、德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都采用了同样的书写体系,那对这些国家的人来说,相互学习对方的语

言将会是何等的方便啊!

对那些与中国有往来的人来说,已经不需要提醒他们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因为最近签订的条约已经允许持护照的外国人自由进出中国,而懂得汉语是深入了解中国的前提条件。对那些懂得汉语的商人、传教士或旅行者而言,他们具备的优势是如何形容都毫不为过的。再者来说,考虑到中国广袤的国土及其与英国的关系,作为最佳交流中介的汉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在前往中国之前,就应该开始学习汉语,而且考虑到汉语难学的特点,我们更应尽快投入到对汉语的学习中来。事实上,国内的学生在动身前往中国之前在汉语学习方面还是能够达到相当的程度的,尤其在书面语及会话方面。就汉字的学习而言,只要有书本便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至于读音方面,因为汉字的读音比较简单,学习一些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句子肯定大有裨益,不过,切忌不能根据英语的表达习惯胡乱编造汉语句子。

在欧洲,缺乏以汉语为母语的教师,致使学生的汉语语法水平普遍低下,好的汉语词典也为数不多,这一切不免让人觉得似乎只有在中国本土才能学好汉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语言知识能够也应该由欧洲的本土汉语教师来教授。至于一些足以吓退初学者的语言难点,本土教师和汉语母语者相比,甚至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工作。为了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消除双方曾经有过的历史误会,我们建议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中国学生可以在此学习英语,英国学生也可在此打好汉语基础;另外我们打算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再兴建一所大学,为两国学生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创造便利条件。每所大学都设有两个系所,分别由来自英国和中国的教师负责。中国学生可以在修习英语的同时学习欧洲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英国学生则可以如母语者一样熟练掌握汉语,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各类产品资源及其对内对外政策,这样的统筹安排必将达成最令人满意的效果。在约三十五年前,此类中英文学校曾经在马六甲兴建过,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倘若当时能在中国开办此类学校,必能取得更为鼓舞人心的成绩。此类学校的开办,须取得双方政府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此类型的教育并非是毫无意义的。资质较高的男孩将是优先被考虑的教育对象,当然,入学学生的家长或亲属应为其支付学费,以降低项目投资人的成本。中国现在正处在内战之中,国内政治异常动荡,目前还缺乏有效稳定时局的手段。随着基督精神的传播和商业往来的逐步深入,传教士和商人必将给中国带来文明与和平。同时,就文化传播来说,我们并不是只介绍欧洲几位经典作家的作品就万事大吉了,而应该通过翻译的方式将西方的宗教及政治精神传入到中国,以此改善其民族心智。对“中华帝国”的国民而言,他们对来自欧洲的文化影响也是相当敏锐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有为数不少的翻译作品面世,并且已在中国发行,如修订版的《圣经》及其他宗教作品。最近也有一些关于天文学、代数学、算术学、几何学、自然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专题论文被译成中文,这很有价值^[6],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此类译著,尤其是关于欧洲历史以及人性思维方面的作品。

注释:

- [1] 在欧洲语言中也有与此类似的字形字音变化,例如:斯拉夫语中的 sha(英语中的 sh 音)源自希伯来语中的 shin;字母 D 源自希伯来字母 X 以及 delta;字母 F 源自希腊字母 digamma X;瑞典语中的 somnar(睡觉的意思)源自拉丁语中的 somnare,等等。
- [2] 文字可以被定义为语言在视觉上的表现形式,这可以分为两类:a)表意文字,该类文字体系独立于任何一种既定的语言之外,指在语言中能够通过字形建立起来的瞬时理解系统;b)表音文字,指对某种语言声音的展示,且对该类文字体系的认识必须依赖于该语言的知识。

其中,表意文字还可以细分为两类,即图画文字(picture writing)与象形文字(figure writing)。图画文字是最为自然的、也可能是最为古老的文字,通过对展现在人眼前的事物绘画而形成文字,这些文字可以展现物体本身没有直接联系的其他象征或者比喻的意义。这种能代表我们视觉的文字是古代文字,其中最为有名的要算图

形文字(《古埃及文法》<Grammaire égyptienne>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Fol. I. p. 3) 图形文字起源于中国和墨西哥。同种类的文字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象征意义,是现实意象和通过智力活动和抽象概念而得到的可能会产生的意象之间的比较和组合。在狄奥多(Diodor) 看来,鹰被埃及人表示为“敏捷”;鳄鱼被理解为“邪恶”;苍蝇为“无耻”;眼睛为“值夜的人”;伸出的手为“慷慨”;紧握的手则表示“贪婪”,但是有些象形文字的所取得的比喻意义的范围是比较远的,比如:蜜蜂比作“国王”;食雀鹰比作“庄严、崇高”;食雀鹰的眼睛表示“远见、沉思”;秃鹰比作“母亲”则考虑到秃鹰的母爱。很多图形文字是神秘的,因为很多这种组合往往是值得怀疑或者是根本不为人所知的,比如:鸵鸟的羽毛表示“公正”,因为鸵鸟的羽毛长度大小都是一个尺寸;棕榈树枝则表示“年”,因为棕榈树每年会长出十二个树枝。在汉语中,两个人,一个人跟着另外一个人,汉字是“从”则表示“跟着”;日和月汉字组合为“明”则表示“亮光”;一个人在山上汉字为“仙”意为“隐士”;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把扫把则为“妇”。

另外一种表意文字则为象形文字,借用汉字的任意性,其实和实际的汉字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如 gay-colored threads(秘鲁人用的彩色线团),因为他们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将这些彩色的线编织和打结。中文的象形文字体系完整,有 2 到 3 万个汉字,他们可以简化为 214 个偏旁部首。属于同一范畴的偏旁还包括医生使用的特殊的技术标记,还有可能像天文学家用来标记行星和星座的标记等。然而,这些标记往往是任意性的,大都是如此的简单和缩略,以至于不断丧失了文字本身和想表达的原物之间的相似度。

[3] 详见皇后大学院长托马森(Thomson) 博士于 1849 年在伦敦所著的《思维律式概要》42 页,牛津大学出版社。

[4] 详见《汉语大辞典》第一部分第一卷 34 页,原文英文为马礼逊(Marrison) 博士所译。

[5] 来自雷慕沙《亚洲杂文集》(法文标题为 Mélanges Asiatiques, 两卷,于 1825-1826 年出版) 第二卷,14 页。

[6] 这些作品包括韦利(A. Wylie) 翻译的《赫歇尔天文学》(Herschel's Astronomy) 及《德尔摩根代数学》(De Morgan's Algebra) 莫威廉(William Muirhead) 翻译的一些关于地理学及英国历史的作品;本杰明·霍伯森(Benjamin Hobson) 翻译的关于解剖学、生理学,及医学作品;麦高恩博士(Dr. Macgowan) 翻译的关于电学、风暴规律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作品;还有罗存德(Rev. W. Lobscheid) 翻译的关于教育学的作品。

印尼本土汉语教师赴华培训班开始报名

为了提高海外汉语教学质量,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积极组织培训班。中国国家汉办东南亚事务处主任丽娟,还专程前往印尼商讨相关事宜,并委托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部中等教育教师与教育行政人员辅导司,负责协助高中与中专华文教师的报名工作,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负责协助大学、初中、小学和补习班华文教师的报名工作。

此次培训分为两班: C 班培训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18 日至 24 日,报名日期为即日起至 2011 年 9 月 8 日截止; D 班培训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10 日至 16 日,报名日期为即日起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截止。

其中,中小学教师班地点如下: 广州——中山大学; 厦门——厦门大学; 长春——吉林大学;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海口——海南师范大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教师班地点如下: 北京——北京大学; 天津——南开大学; 武汉——武汉大学; 大连——大连外国语学院。

现任职于大学、初中、小学的本土汉语教师、补习中心、家庭教师及持永久居留证明的中国公民,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中文较流利,身体健康(由于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暂不接受行动不便者报名)者均可报名。

主办方称,参加过 2010 年度国家汉办举办的来华外国本土汉语教师教材培训班的教师,不可报名参加本次培训。已报名参加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外国汉语教师来华研修项目的教师不能转班。

(本刊记者)